

排孔开新与国民性改造

张艳国

(武汉大学 历史系,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化新人为着中国现代文化价值的重建和文化信念的确立,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激烈的排孔开新,由批判旧文化旧思想到重视社会主体——人的问题,主张进行国民性改造,这就为五四时期的排孔开新找到了一条新路。这样,国民性改造问题,就成为排孔开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链条中的一个关节点。国民性改造的讨论在排孔开新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是新文化运动进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对问题讨论的一种深化。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出发点是国家发展、民族前途的根本问题,因此,它不会满足于思想文化领域的破与立,必然要以社会主体的根本改善为问题的解决和答案。

[关键词]五四新文化运动;排孔开新;文化新人;国民性改造

[作者简介]张艳国(1964—),男,湖北省仙桃市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科研教育管理处处长、研究员,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3)03-0174-05 **[收稿日期]**2003-02-08

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的大转折、大变革时期。在精神生活领域里突出表现为对新的信仰和新的价值标准的强烈要求。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统治,封建专制主义的合法外衣被无情地扒下。激烈的政治革命之后,必然出现精神领域的信仰危机和价值困惑。旧的信仰被革命运动瓦解了,新的合乎中国历史进步要求的信仰是什么呢?旧的价值体系在革命运动中崩塌了,新的反映中国历史前进方向的价值目标是什么呢?这不能不是当时中国人所关注所思考的问题。社会的急遽转换成思想的苦痛,使一切置身于社会变革的人们都不能例外。鲁迅曾经回忆过他在俄国十月革命前的思想状况,有过彷徨、失望与颓唐,“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1](第4卷, P455)];也有过矛盾和困惑,“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1](第6卷, P18)]。智者如鲁迅,尚且有如此的精神痛苦,遑论其他?

一部分人陷入对旧世界的迷恋而不能自拔,便反对图新;一部分人热烈地憧憬新世界而毅然前行,便反对守旧。以旧拒新,怀抱的是旧信仰和旧价值;弃旧扬新,依据的是新信仰和新价值。无论是破旧,还是迎新、立新,都离不开人的问题。在五四时期的文化新人如陈独秀、李大钊、吴虞、鲁迅、胡适等人看来,封建主义

的孔子之道及其维护者,是要以旧文化旧思想禁锢人的思想,毒害人的精神,使人成为封建主义及其统治者驯服的奴隶;新文化运动则是文化启蒙运动,它要拯救人的心灵,拯救人的精神,用科学的光芒和理性的精神驱散封建主义的阴云迷雾。文化新人认为,什么国性,什么国粹,统统是为旧文化张目开道的,是害人的精神鸦片,仅仅打倒“国性论”、“国粹论”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人们长期受封建主义的毒害和统治,已经丧失了主体精神。因此,既要扫除毒害人们心灵的旧文化,又要重新塑造人。在文化新人看来,用新文化新思想与封建主义争取人,挽救人,就必须立即进行国民性改造,这就为五四时期的排孔开新找到了一条新路。这样,国民性改造问题,就成为排孔开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链条中的一个关节点。这是值得研究者重视的。

国民性,是一个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历史文化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上的投影。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造就不同的国民性。依据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18)]社会的历史文化联系也要在社会主体上打下深深的烙印。据此,可以说,国民性就是对于这种联系性的抽象。恩格斯在《奥地利末日的开端》中指出,德国的内陆地区与其他

地区的国民性不同,缘于地理条件的阻隔和人文传统的差异,国民性的差异又对社会近代化历程造成巨大影响^{[3](P517)}。这对于我们认识国民性,提供了理论与方法论的指导。

五四时期的国民性改造观,是辛亥革命时期国民性改造探讨的历史发展。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者认为,要建立新中华,必须“铸造新国民”。他们认为,“奴性”支配了国民性,使我中华民族只有奴隶,而没有国民。邹容说:“吾谓宴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者,无往而非奴隶。”^[4]奴性充斥,致使我民族死寂沉闷,丧失了生机活力,不仅老百姓“平素偷安旦夕,心醉平和,家室稍康均沾沾自喜,不复知人间有忧患事……其处事也,无主角无棱角,习于怯懦,莫能拒大敌;其风度从容不迫,圆满和乐也;其天性平凡而单纯,无变化无波澜也”^[5],而且奴性弥漫于青年学生中,无爱国心,无博爱心,无进取心,无独立心,无自尊心,无希望心,无怀疑心,无知耻心,无勇敢心^[6]。他们期望经过“国民性改造”,改变人们“有奴隶之性质,无国家之思想”的状况,“不二十年,溟渤之西,昆仑之东,必有光怪陆离、吐虹贯日之奇彩出现于世界,将凌驾于欧美,横决一切,而为全球之主人翁也”^[7]。总之,辛亥时期的“国民性改造”舆论,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依据,为实现民主革命的理想服务,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辛亥时期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在理论深度上有明显的不足。主要是对于“国民性”的社会经济根源、思想文化根源、历史传统根源等挖得不深,简单地责备人民群众。其实,人民群众是可恶的社会制度、反动的封建思想的最大受害者。要进行“国民性改造”,就必须着眼于造成“根性”的缘由。这个历史任务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来承担的。

文化新人认识到,只有全民族的觉醒,才是谋求中国进步的可靠出路。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只有人的觉醒,才能实现“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中国才有希望。陈独秀指出:“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退化,如此堕落,即人不我伐,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 一国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以上者,一时遭逢独夫强敌,国家濒于危亡,得献身为国之烈士而救之,足济于难;若其国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以下者,则自侮自伐,其招致强敌独夫也,如磁石之引针,其国家无时不在灭亡之数,其亡自亡也,其灭自灭也;即幸不遭逢强敌独夫,而其国之不幸,乃在遭逢强敌独夫以上,反以遭逢强敌独夫,促其觉悟,为国之大幸。”^{[8](P61)} 吴虞说,“夫人之生活,在其精神”,精神委顿,则陷于墮败;精神焕发,则达致共和^{[9](P109)}。鲁迅则说,要想中国有救,有希望,“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

行的”。鲁迅的这个结论,是对民国以后十余年间社会状况进行察考、分析之后得出的,社会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1](第11卷,P31)}。

二

文化新人认识到,要进行“国民性”改造,重要的是摧毁毒害国民精神的孔子之道以及旧文化旧思想,将国民从旧文化的苦难中解救出来。他们从社会制度与文化传统方面查找根源。李大钊设惊人之问:“是甚么残酷的制度,把我的民族性弄成这样的不自然!”^{[10](下卷,P105)}陈独秀指出,造就“亡国贱奴之根性”者,有三因:一是数千年来统治人们思想的孔子之道,二是君主专制政治制度,三是大一统的封建主义经济制度。他悲愤地说:“由是而知吾国社会恶潮流势力之伟大,与夫个人抵抗此恶潮流势力之薄弱,相习成风,廉耻道丧,正义消亡,乃以铸成今日卑劣无耻退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 呜呼,悲哉! 亡国灭种之病根,端在斯矣!”^{[8](P24-25)}鲁迅在同旧文化的激战中,系统地分析了旧文化对于“国民性”的坏处,有如下四端:一是悠久的历史造就古代中国文明,高于邻国,从而傲睨万物,自尊自大,久而久之,以“固有文明”为口头禅,不思进取,害怕革新,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民族精神日益颓委;二是封建专制制度压制个性发展,大搞“愚民统治”,社会生机日益丧失;三是封建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引导人们向后看,培养苟安退守自满的民族性格,进取的民族精神日益堕落;四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培育了驯服盲从迷信保守的民族精神。他认为,在“国民性”中突出的表现是“个人的自大”与“爱国的自大”。这两种“自大”,足以造就“不长进的民族”,足以使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11](P311-314)}。所以,鲁迅怀揣着“理想的光”,勇猛地向着“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冲锋。1925年,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还说,旧文化是一个十足的酱缸,必须对它进行文化改革,促进国民性改造:“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酱缸,无论加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能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1](P20)};“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1](第11卷,P32)}。这一年,是鲁迅正面论述国民性最多的一年。仅在这一年中,鲁迅使用“国民性”就多达十几次,几乎超过以前二十年间使用这一概念的总和^{[11](P285)}。

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期,文化新人所使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而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则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理论与方法的选择和运用,服从和服务于思想斗争的主题。

“国民性改造”，实质上依然是去旧扬新的问题。评孔批孔，主要是在思想领域里进行革命；“国民性”改造，虽然也离不开思想的层面，但其重点却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和承担者。观念形态的革命则只是主体“改造”的一种必要的依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科学与民主既时髦，又是最先进的武器，因此，从事“国民性改造”工作得依靠它；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后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来了，更先进更锐利的武器来了，因此，“国民性改造”工作理所当然以它为指导。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自不必说，就连“党外人士”的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回忆他自己的心路历程时，也直言不讳地说：“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1](第4卷, P191)}他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思考着“国民性”改造问题。总之，围绕着排孔开新的文化主题，探讨中国文化的信念坐标和价值选择，研究国民性改造的方案和路径，既代表着中国文化由旧创新的发展要求与前进方向，又体现着先进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陈旭麓对于五四文化新人在排孔开新中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进行现代价值重建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一先进的文化群体张扬着新的时代精神^{[12](P391)}；胡绳则对于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在排孔开新中善于与时俱进，勇于冲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樊篱，找到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由关注文化问题转而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们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当做观察国家民族命运的工具，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飞跃^{[13](P356)}。

三

在新文化运动中，文化新人以全民族的“国民性”改造为基点，但在讨论问题时，有两个突出的兴奋点：

一是“国民性改造”要着眼于青年。青年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也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有生机活力，是否有希望的主要标志。五四时期新文化与旧文化斗争的焦点，在思想文化上说，是对于孔子以及孔子之道的评判；在社会主体上说，则主要是争夺青年。不仅社会发展是如此，而且即便是思想文化的传承也是如此，谁拥有青年，谁就获得了未来。为着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为着中华民族的未来，文化新人以新的世界观、新的人生观、新的文化观教育青年，唤醒青年，塑造青年，满腔热忱，不遗余力。

文化新人描述青年的特征，揭示青年的社会意义，高歌一曲青春之歌。他们认为，青年在国家、民族的发展中居于重要的位置；青年置身于社会发展之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要失去生机活力，就要停滞不前了。

李大钊歌颂青春，歌颂青年之青春，愿青年“致我为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他说：“彼幽闲贞静之青春，携来无限之希望，无限之兴趣，飘然贡其柔丽之姿于吾前途辽远之青年之前，而默许以独享之权利。嗟吾青年可爱之学子乎！彼美之青春，念子之任重而道远也，子之内美而修能也，怜子之劳，爱子之才也，故而经年一度，展其怡和之颜，饯子于长征迈往之途，冀有以慰子之心也。……青年锐进之子，尘尘刹刹，立于旋转簸扬循环无端之大洪流中，宜有江流不转之精神，屹然独立之气魄，冲荡其潮流，抗拒其势力，以其不变应其变，以其同操其异，以其周执其易，以其无恃其有，以其绝对统其相对，以其空馭其色，以其平等律其差别，故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10](上卷, P194, 196)}在李大钊的笔下，青年与青春，是何等的一幅美妙的彩图，是何等令人钦羡！对于唤醒时代青年的青春意识是有积极作用的。

文化新人以新思想新文化教育青年，鼓励青年在旧社会旧时代敢于塑造新人格、新形象，做“新青年”。他们认为，虽然从年龄上、生理上讲，有划定青年的标准，但那只是自然意义上的青年；如果从心理和社会角度看，青年的标准与社会发展的主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分为旧青年和新青年。文化新人勉励青年成为新青年，与旧青年决裂，为造青春之中华作出贡献。陈独秀宣传新时代的人生观，指出，“人生的真义”，是真实的人生，是幸福的人生，是奋斗的人生，是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人生。“总而言之：人生在世，究竟为什么？究竟应该怎样？我敢说道：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个人也能够享受。递相授受，以至无穷。”^{[8](P127)}在《敬告青年》中指出，新青年与旧青年有着截然的分别：新青年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由旧青年转换为新青年，必须有确当之人生信仰，陈独秀认为：“第一当明人生归宿问题。……前瞻古人，后念来者，此身将为何如人，自不应仅以做官求荣为归宿也。第二当明人生幸福问题。……幸福之为物，既必准快乐与痛苦以为度，又必兼个人与社会以为量。”“吾青年之于人生幸福问题，应有五种观念：一曰毕生幸福，悉于青年时代造其因；二曰幸福内容，以强健之身体正当之职业称实之名誉为最要，而发财不与焉；三曰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四曰自身幸福，应以自力造之，不可依赖他人；五曰不以现在暂时之幸福，易将来永久之痛苦。

信能识此五者，则幸福之追求，未尝非青年正当之信仰”^{[8](P44)}。对于“新青年”的人格魅力与形象风采，李大钊界定道：“艰虞万难之境，横于吾前，吾惟有我、有我之现在而足恃。堂堂七尺之躯，徘徊回顾，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惟有昂头阔步，独往独来，何待他人之援手，始以遂其生者，更胡为乎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哉？惟足为累于我之现在及现在之我者，机械生活之重荷，与过去历史之积尘，殆有同一之力焉。”^{[10](上卷，P204)}惟此，则如陈独秀所言：“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头脑中必斩尽涤绝彼老者壮者及比诸老者壮者腐败堕落诸青年之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始得谓为新青年而非旧青年，始得谓为真青年而非伪青年。”^{[8](P43)}做时代的“新青年”，就要同毒害人的孔夫子之道决裂，具有主体自觉和社会自觉。陈独秀大声疾呼：“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8](P3)}李大钊十分赞同陈独秀的论点，强调道：“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一在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他认为，青年之自觉，青春之灿烂，关切国家民族之生存与发展，不可等闲视之，“吾之民族若国家，果为青春之民族、青春之国家欤，抑为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国家欤？……此则系乎青年之自觉何如耳！”^{[10](上卷，P204、199)}鲁迅鼓励青年不要屈服于旧思想旧文化的压制，勇敢地向前走。他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我又愿中国青年都只是向上走，不必理会这冷笑和暗箭。”^{[1](第1卷，P325)}钱玄同提醒道，与旧文化旧思想决裂，一要有勇气，二要有独立的思想，“青年呵！如其你还想在二十世纪做一个人，你还想中国在二十世纪算一个国，你自己承认你有脑筋，你自己还想研究学问；那么，赶紧鼓起你的勇气，奋发你的毅力，剿灭这种最野蛮的邪教和这般兴妖作怪胡说八道的妖孽！”^{[14](P11)}

文化新人强调青年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指出革命青年的成长道路。他们认为，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换的历史性时刻，青年一定要担负起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自新自励，勇猛前进。陈独秀指出：“自觉勇于

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8](P4)}李大钊在《青春》中说：“凡以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固莫不惟其青年是望矣”，“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鲁迅指出，“青年的使命”是要走出人们“永久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这古已有之的时代其实就被“人肉筵席的文明”占据着，“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1](第1卷，P213-216)}李大钊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中，指出了青年的努力方向。他说，“第一，现代的青年，应该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要在热闹的方面活动”；“第二，现代的青年，应该在痛苦的方面活动，不要在欢乐的方面活动”；“第三，现代的青年，也应在黑暗的方面活动，不要专在光明的方面活动”。李大钊所揭示的青年努力方向，有着丰富的时代内涵：一是时代青年要勇于脚踏实地、坚定地向着黑暗冲锋，向着光明前行，因为“黑暗寂寞中所含的，都是发生，都是创造，都是光明”；二是时代青年要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担负救民于水火的重任，因为“劳动的人，仍不免有苦痛，仍不免有悲惨，而且最苦痛最悲惨的人，恐怕就是这些劳动的人。所以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三是现代青年要有坚忍不拔、敢于牺牲的英雄气概，同黑暗斗争到底。李大钊关于青年努力方向的论述，给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青年成长的道路以巨大启发。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的一系列论述与此一脉相传，又有所推进。毛泽东号召“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15](P565)}。毛泽东认为，同工农大众相结合，是一个原则问题，“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结合的问题，是革命运动中的一杆标尺，它衡量知识分子是否革命^{[15](P559-560)}。

二是“国民性改造”要立足于教育。教育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地方，如果教育不能培育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那么，教育本身就有问题了，就应该改革了。文化新人重视教育，因为在他们看来，在旧社会旧时代，

封建统治者以教育为工具,灌输孔子之道,控制人,毒害人,要改造“国民性”,就得从教育着手。陈独秀指出,旧教育没有实现教育人、培养人的功能,“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重任而致远乎?”显然,传统教育是失败的。他强调,要围绕教育对象、教育方针和教育方法进行改革,以利于培养出能使我国“起死回生”的有用人才;一切着眼于人才的培养,必须学习近代欧美教育,“现今欧美各国之教育,罔不智德力三者并重而不偏倚,此其共通之原理也”^{[8](P201)}。西方的教育能够培育出社会的有用之才,得益于与中国传统教育相反的教育方针:一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启发的而非灌输的;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直观的而非幻想的;三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它不是仅仅灌输知识,而是要健全人,发展人^{[8](P106-109)}。吴虞一方面批判孔子之道,指出贯穿孔子之道精神的旧教育是培养不出治国安邦的人才的,他发表的《人才》一文在四川教育界引起极大震动;另一方面,他在四川教育界宣传新思想,呼吁教育改革,促进了“风气进化”。他在致胡适的信中为我们透露了新的信息:“弟乃从各校学生着手,为文化之输入。现在学生颇有觉悟者,各于校中组织书报社,购置新书杂志,校长亦无如之何。”^{[9](P390)}由于中国固有的文明无法解决改善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因此,无论是陈独秀、李大钊,还是吴虞、鲁迅,或者是钱玄同、胡适,他们都一致认为,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出路在于取法于欧美教育的中国教育改革。1921年4月,陈独秀在《新教育是什么?》的文章中,还在恳切地呼吁中国教育的根本改变,宣传“新教育底主义和方法都和旧教育完全不同。新教育底效力大过旧教育”^{[8](P387)}。在他们看来,只要中国能够建立起新型的教育体系,就能够确立全新的民族文化体系,“国民性”改造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思想文化斗争,从来都只是推进社会历史进步的一个方面、一种手段。如果离开了掌握思想文化的主体,不仅社会发展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思想文化斗争本身而言,也显得毫无意义。破旧文化旧思想,立新文化新思想,最根本的是人的问题,民族素质问题。因此,由关注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重建和文化信念的确立,在思想文化领域着手排孔开新,引起国性的讨论,国粹的批判,深入到国民性改造,这是新文化运动进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对问题讨论的一种深化。新文化运动的出发点是国家发展、民族前途的根本问题,因而它不会满足于思想文化领域的破与立,必然要以社会主体的根本改善为问题的解决和答案。

【参考文献】

-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4]区架甲.中国历代革命说略[N].清议报,第31期.
- [5]中国之改造[J].大陆,第8期.
- [6]李书城.学生之竞争[J].湖北学生界,第2期.
- [7]海门.泰西教育界之开慕者阿里士多德之学说[J].江苏,第2期.
- [8]陈独秀.独秀文存:卷1[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 [9]吴虞.吴虞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 [10]李大钊.李大钊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11]王锦全.鲁迅“国民性思想”讨论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 [12]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 [13]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14]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2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 [1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Against Confucius to Favor Creation and the Recasting of the Nationality

ZHANG Yan-guo

(Department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representatives of new cultures were strongly against Confucius in ideology and culture so as to establish the value and confidence of the Chinese modern culture. Only in this way did the discussion of recasting the nationality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This movement aimed to involv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so it wanted to improve the nationality as its main task beyond the scope of ideology and cultures.

Key Words: the May 4th Movement of new cultures; against Confucius to favor creation; representatives of new cultures; the recasting of the national people

【责任编辑、校对:田卫平】